



未名社科·媒介与社会丛书（翻译版）

The Elements of Journalism

What Newspeople Should Know and the Public Should Expect

# 新闻的 十大基本原则

新闻从业者须知和公众的期待

〔美〕比尔·科瓦齐（Bill Kovach）汤姆·罗森斯蒂尔（Tom Rosenstiel）著  
刘海龙 连晓东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e Elements of Journalism

What Newspeople Should Know and the Public Should Expect

# 新闻的 十大基本原则

新闻从业者须知和公众的期待

[美] 比尔·科瓦齐 (Bill Kovach) 汤姆·罗森斯蒂尔 (Tom Rosenstiel) 著  
刘海龙 连晓东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8-103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 新闻从业者须知和公众的期待/(美)科瓦齐  
(Kovach, B.), (美)罗森斯蒂尔 (Rosenstiel, T.) 著; 刘海龙, 连晓东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  
(未名社科·媒介与社会丛书)  
ISBN 978-7-301-18179-9

I. ①新… II. ①科… ②罗… ③刘… ④连… III. ①新闻工作者—  
职业道德—研究 IV. ①G2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2910 号

THE ELEMENTS OF JOURNALISM: What Newspeople should Know and the  
Public should Expect  
by Bill Kovach and Tom Rosenstiel  
Copyright © 2001 by Bill Kovach and Tom Rosenstiel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uthor  
c/o Black Inc., the David Black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 新闻从业者须知和公众的期待  
著作责任者: [美]比尔·科瓦齐 汤姆·罗森斯蒂尔 著 刘海龙 连晓东 译  
责任编辑: 张盈盈 周丽锦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8179-9/G·300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mailto: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65016/62753121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6 印张 254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译者前言

## 从默会知识到公共知识

2009年我在美国访问期间,与一位曾做过记者的新闻学者谈起手头正在翻译的《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她会意地一笑说:“你说的是那本新闻工作者的‘圣经’吧。”类似的反应我在不少人那里见过,可见此书在美国新闻界影响之大。我将部分译文发到“人人网”(当时还叫“校内网”)时,几位同学回复说,这本书已经被作为他们的教材使用。我之前了解到此书曾被港台地区的一些学校列为教学参考书,但没想到它早已经悄然进入内地的新闻学课堂。为了让更多的新闻学子和新闻工作者读到这本近年来少有的新闻研究佳作,我和妻子利用在美国访学期间的闲暇时间,翻译了此书。

本书的两位作者都有长期的新闻实践和新闻研究经历,因此该书贴近现实,生动活泼,2001年一问世便迅速成为畅销书,目前呈现给读者的是2007年出版的修订版。这一版与第一版相比,加入了一条新的原则,并增加了不少新案例。

作者之一比尔·科瓦齐在《纽约时报》工作过18年(1968—1986年),曾任华盛顿分社社长,在《亚特兰大宪章报》工作过两年,担任过哈佛大学尼曼基金的负责人、卓越新闻项目的资深顾问和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教师,他还是本书导论中提到的“热心新闻工作者委员会”的创始人。据他介绍,他曾随福特总统和卡特总统来访过中国。本书的另一位作者汤姆·罗森斯蒂尔在《洛杉矶时报》和《新闻周刊》等媒体有长达30年的新闻工作经验。1997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创立了“卓越新闻项目”,2007年该项目从哥大分离出来,成为皮尤研究中心的项目。该项目的网站 [www.journalism.org](http://www.journalism.org) 是新闻研究领域的知名网站。他们二人还

合作出版过一本名为《扭曲的速度》(*Warp Speed: America in The Age of Mixed Media*, 1999)的书。

我通过朋友联系到两位作者,他们非常支持本书的翻译工作,科瓦齐先生不仅就翻译中的一些问题给予了耐心解答,还和罗森斯蒂尔一起为中文版撰写了序言,并热情希望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也能加入到这些问题的讨论之中。

### 作为实践智慧的新闻学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这本近年来在美国新闻界颇具影响的著作,有必要先把它放回写作的语境中,然后再来思考它对于中国新闻界的启示。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中美新闻研究和新闻教育存在一个明显的差异:在中国被奉为显学、从业者必修的新闻理论,在美国几乎找不到踪影。这并不是说美国的新闻教育中没有理论成分,而是他们认为新闻工作作为一种实践,具有知行合一的特点,新闻精神已经融入到了采写编评等实务课程之中,不需要单独开设一门理论课来传授。此外,对于崇尚言论自由的美国人来说,写新闻是一个中立的技术活,毋需加上太多条条框框。正因为如此,“journalism”才既有中文里的“新闻学”的意思,又有“新闻工作”的意思。<sup>①</sup>从广义上来讲,新闻研究也是新闻工作的一部分,在实践与理论之间,新闻学离前者更近,离后者较远。所以学者们也大可不必一听到“新闻无学”便着急上火。这里的“学”指的是学院派尊崇的以发现新知识为取向的智力游戏。这就像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访问中国时曾说过“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一样,他所说的“哲学”特指源于古希腊的理性智慧,并不含有贬低中国人的意思。<sup>②</sup>同样,这种学术取向的“学”对于新闻工作来说有用,但很间接。新闻工作需要的是能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智慧。尽管看上去,理论取向的新闻学术研究和实践取向的新闻学讨论的是同一个对象,但是二者的旨趣和方法却存在着很大差异。

就在美国的新闻研究者内部,这个分歧也十分明显。在这两类研究的期刊上表现得比较突出,尽管近年来一些刊物(如 *Journalism*)试图调和这种分歧,但是《哥伦比亚新闻评论》(*Columbia Journalism Re-*

---

① 潘忠党:《新闻与传播之别——解读凯里〈新闻教育错在哪里〉》,《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4期。

② 杜小真、张宁主编:《德里达中国讲演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页。

view)和《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的不同还是一望可知的。芭比·泽丽泽(Barbie Zelizer)依据研究主体的不同,把新闻研究分成了新闻工作者、新闻教育者和新闻学者三个诠释共同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她形象地把这三者之间的分歧做了如下描述:

新闻工作者说新闻研究者和教育者无权把他们的脏衣服晾出来给人参观;新闻研究者说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教育者不够理论化;新闻教育说新闻工作者把头埋在沙子里,新闻研究者把头伸进云里。<sup>①</sup>

按照这个划分,《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应当属于新闻教育者的话语,对过于现实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可能嫌它太理想化,而对学院派的新闻学者来说,则会嫌它陷于新闻专业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能自拔。在中国,新闻教育者和研究者的分化还不明显,导致了对“新闻理论”的理解与美国不大相同。

中国的新闻理论也不是从新闻学研究一开始就存在。在早期翻译的松本君平的《新闻学》和休曼(Edwin Shuman)的《实用新闻学》(*Practical Journalism*)<sup>②</sup>,以及徐宝璜写的《新闻学》、邵飘萍写的《实际应用新闻学》等<sup>③</sup>中国新闻学的源头中,都沿袭了美国式新闻研究的这种追求实用智慧的精神,基本属于泽丽泽划分的三类诠释共同体中的新闻教育者的传统。

当代中国新闻理论的出现可追溯到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sup>④</sup>,这篇破中有立的文章把唯物主义思想引入新闻研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闻学结合在一起,开创了我国新闻学研究的哲学传统。20世纪50年代通过学习苏联新闻教育模式,这套新闻理论得到进一步完善。从产生的语境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闻理论是对当时新闻体制的正当化过程(legitimation),其主要目的不是指导实践,而是试图通过唯物主义哲学回答社会主义新闻体制是否具有合理性的问题。这个知识

---

① Barbie Zelizer, "Journalism and the Academy", in *Handbook of Journalism Studies*, Karin Wahl-Jorgensen and Thomas Hanitzsch ed.,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09, pp. 29-41.

② Edwin L. Shuman, *Practical Journalism: A Complete Manual of the Best Newspaper Methods*, New York: N. Y.,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903.

③ 见徐宝璜等:《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

④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转自《陆定一新闻文选》,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

体系偏重学理,在实践维度上并无独特的贡献,这一缺失直接导致了1978年以后在新闻教育的课堂上“西方的”(主要是“美国的”)新闻实践方法和唯物主义新闻理论表面上“和平共处”的特殊局面。

中国新闻理论产生的语境对今天的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影响深远。由于路径依赖和体制原因,哲学(包括非唯物主义的哲学)成为中国新闻理论的主要背景学科,追求学术化、理论化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主流。但另一方面,由于不少研究者没有意识到学术理论与实践知识的区别,缺乏研究规范,一批打着学术研究之名,既无理论建树,又无实践价值的所谓学术成果充斥着新闻理论研究领域。当这种“学术研究”与海外对接时,又意识到自身和美国新闻教育者的研究相比过于理论化,与美国的新闻学术研究相比,又缺乏规范。于是它把前者划入新闻业务和技巧的范畴,把后者划入“传播学”范畴。<sup>①</sup> 这便出现了前面提到的在美国的新闻教育中没有“新闻理论”的现象。

这里对中国新闻理论产生背景的简单回顾,目的并不是否定它,而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中西新闻理论的差异。正如译者在另一篇论述传播学本土化的文章中提出的,我们要正视中国特色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而不是采取一种鸵鸟似的回避态度或非此即彼的否定态度。<sup>②</sup> 但是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仍然抱着寻找中国式新闻理论的心态来看这本《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肯定会失望而归,因为它大多是一些经验的总结,谈不上多高深。在美国的书店里,如果碰巧没有“新闻”这一分类的话,这本书多半会被放到“语言”或“写作”的书架上。

## 作为手工艺的新闻工作

《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不是一本纯学术著作。正如副标题“新闻工作者须知和公众的期待”所提示的,这是一本针对新闻工作者和普通公民

---

<sup>①</sup> 比如近年来译介的北美学术界的研宄如《做新闻》、《什么在决定新闻》、《发掘新闻》、《维系民主》等成果都被列入传播学的系列丛书。当然,这个“传播学”也是中国新闻学研究者建构起来的他者。通过对立面的建构,中国的新闻学进一步完成了自己的正当化过程,形成了本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实用/虚文等一系列二元对立。见刘海龙:《被经验的中介和被中介的经验——从传播理论教材的译介看传播学在中国》,《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5期;刘海龙:《“传播学”引进中的“失踪者”:从1978年—1989年批判学派的引介看中国早期的传播学观念》,《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

<sup>②</sup> 刘海龙:《从受众研究看“传播学本土化”话语》,《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7期。



的普及性读物。科瓦齐先生在给我的信中强调,这本书的主旨是找出合格的新闻工作者所应具备的最基本的个人品质,也就是书中总结的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

1. 新闻工作首先要对真实负责。
2. 新闻工作首先要忠于公民。
3. 新闻工作的实质是用核实进行约束。
4. 新闻工作者必须独立于报道对象
5. 新闻工作者必须成为独立的权力监督者。
6. 新闻媒体必须成为公众评论和妥协的论坛和广场。
7. 新闻工作者必须让重大事件变得有趣并且与受众息息相关。
8. 新闻工作者应该使新闻全面均衡。
9. 新闻工作者有责任按良心行事。
10. 公民对新闻也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

在本书的修订版里,增加了初版没有的第十条原则,对公民也提出了要求。不论这些原则的细节如何变化,其道一以贯之,就是作者们在导言里提出的“新闻工作的目标是向人民提供获得自由和自治所需的信息”。自由是个人权利的核心,自治(self-governing)是民主的精髓。与中国的新闻理论倚重哲学不同,美国的“新闻理论”把政治学作为最重要的背景学科。新闻与民主的关系是本书十大主题背后的复调。

细心的读者还会注意到,上述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y)并不是逻辑思辨的结果,而是通过大量的调查与访谈,对新闻工作者共识的描述。它用研究实然世界的经验方法,完成了对应然原则的建构。换句话说,这些原则不是客观的法则(law),而是新闻工作者们约定俗成的行业规则(rules)。这一点也体现出美国新闻研究注重实践智慧的特征。

近年来,不少研究者不再把新闻工作看成是一个专业(profession),而是把它看成一门手艺(craft)。<sup>①</sup> 因为和更具有专业性的医生、律师、会计等职业相比,新闻工作中能够被规范化、标准化的部分实在有限。多数新闻工作者是在实践中,在师傅的言传身教中摸索、试错、领悟而成为熟练匠人的。在一代又一代新闻工作者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共同体接受

<sup>①</sup> Barbie Zelizer, *Taking Journalism Seriously: News and the Academy*, Sage, 2004, p. 34.



的行业规则。因此，作者们认为，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必须在传统内寻找，而不是通过逻辑推导植入。但是或许是出于谨慎，或许是出于对《宪法第一修正案》中不得为言论立法的敬畏，新闻工作者流传下来的这些原则从未被清晰地阐明过。此书的重要贡献，不在于它提出了什么全新的见解，而是首次把美国新闻传统中这些默会的知识(tacit knowledge)转换成了用语言表述的公共知识(public knowledge)，让它们接受来自不同媒体和文化的新闻工作者的实践检验。

“默会的知识”是由匈牙利学者卡尔·波兰尼提出的概念，他认为人类的知识除了可以言说的知识(articulated knowledge)外，还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默会的知识。后者来自长期经验积累，是主观的、个人化的知识。<sup>①</sup>之前提到的“新闻无学”所包含的另一层含义，正是指新闻工作的这种无法通过语言把握，只能通过师傅带徒弟、依靠每个实践者体会顿悟的特征。波兰尼有一句名言——“我们知道的比我们说出的要多”，然而语言的吸引力如此之大，老子明知“道可道，非常道”，仍要花上五千字来解释他所谓的“道”。本书的两位作者也固执地想通过自己的调研，把这些被新闻工作者当作理所当然的直觉变成能够被讨论的公共知识。

本书名为“The Elements of Journalism”，正有此喻意，基本元素须臾不可离，但却易被当成理所当然之事而忽略。这个书名写成英语一目了然，但要翻译成准确的中文却令译者颇为踌躇。除了前面讨论过的“journalism”难译之外，信达雅地把“elements”的含义传达出来也不容易。这个概念来自于古希腊和许多文明中都存在的“元素说”，认为世界是由一种或几种基质构成，比如古希腊的土、水、气、火，中国的“五行”说等。作者用这个比喻来暗示这些原则具有普世性，是新闻活动的基础。但是在中国的新闻理论里，“新闻的元素”或者“新闻的要素”一般指构成新闻事实的5W和1个H，一时难以改变。笔者发现作者在文中有时也使用“principles”来换用“elements”，“基本原则”这个概念倒是不易引起误解。在卓越新闻项目的网站上，这几条规范也被称为“新闻工作的原则”(principles of journalism)。<sup>②</sup>我给作者科瓦齐发去电子邮件，询问可

---

① [英]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许泽民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② 见 <http://www.journalism.org/resources/principles>。

否用 principles(基本原则)来翻译书名,也得到了他的肯定。<sup>①</sup>

## 美国新闻业的危机

为什么作者们要选择在这个时间点上做这个总结性的工作呢?按照他们的说法,是因为美国的新闻界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如果更直白一些,就是随着产业和技术的发展,美国的新闻界出现了价值危机。在令人不知所措的新形势下,新闻工作的标准是与时俱进,还是坚守传统?如果坚守传统,哪些传统是时代的产物,哪些传统是永恒的?

这本《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正是对上述问题的回应。本书之所以被称为新闻的“新保守主义”的代表,就是因为它在主张适应变化的同时,更强调坚守新闻工作的传统,提倡通过修炼内功,来应对来自不同方向的挑战。

美国新闻业面临的危机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一是集团化、公司化带来的价值危机和经济危机。非新闻行业的大公司经营新闻媒体带来的新闻质量下降、新闻标准滑坡和对多元观点的压制已经不是新鲜话题,本书也多有涉及。此外,书中提到的一些现象近年有了新变化,2008年以来美国经济危机导致一些历史悠久的知名报刊停刊或转向网络出版更带来了我们对媒介经营模式的思考。不少媒体的问题并不出在发行量和新闻质量上,而是出在经营上。有的媒体是被投资市场将市价炒得过高,致使媒体拥有者(多来自非信息产业)以虚高的价格购入媒体,欠下银行大笔贷款,一旦金融市场泡沫破裂,资金链出现问题,公司就面临破产危机。还有的媒体是因为盈利模式过于依赖广告,一旦经济情况不好,或者广告商对媒体失去信心,媒体就会面临经营困境。比如2010年老牌新闻杂志《新闻周刊》尽管仍有100万份的发行量,但是由于广告商不愿在此刊物上投放广告,遂陷入危机,最后不得不以1美元低价出售。新闻媒体如何保证其经营模式更稳定?是否可以在私有化、商业化模式之外探索其他的经营模式?但是相比这些问题,本书更关注的是如何通过优质的内容和消费者建立起更牢固的关系,认为只有受众的关注和支持才是媒体抵御外界冲击的关键。

第二个危机是客观中立的价值正受到挑战。受市场萎缩的影响,为

---

<sup>①</sup> 展江教授建议将书名译为《新闻学精义》,这是个很符合中文表达的意译。亦列于此,供读者参考。

吸引眼球,近年来美国一些媒体放弃了客观中立的信条,以言论类谈话节目和福克斯新闻为代表,走上了一条言论化新闻的道路。发表见解本身没有错,但是作者们认为如果在观众不知情的情况下,以观点剪裁事实,甚至歪曲事实,则违背了新闻的基本准则。这一危机暴露了传统客观性原则固有的缺陷,这一点早就为学界所诟病。<sup>①</sup> 言论化新闻的支持者提出,因为谁也不能宣称自己是客观的,不如放弃它,比如保守派媒体就指责美国的主流媒体具有“自由主义偏向”,二者是五十步笑百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者们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新的原则——透明性(transparency)。他们认为,既然谁也无法保证自己不偏不倚,索性放弃这种自我标榜,老老实实地把调查和判断过程、立场和预设向受众公开,让他们来评判、选择和监督,以方法和程序的客观来代替结果的客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作者们完全放弃了传统的客观性概念,而是提醒新闻工作者放弃传统的武断,重新建立一种透明的客观性或受监督的客观性。

第三个危机是新闻的娱乐化。新闻娱乐化是商业逻辑影响新闻价值观的后果之一。如果把新闻仅仅看成是吸引受众注意力的信息产品,新闻与娱乐的区别就会荡然无存。按照传统的看法,这样做会导致新闻的目标由为公众服务转向俘获更多的消费者,新闻的公共性将遭到破坏。但是在严肃新闻的受众日益萎缩以及老龄化的条件下,以乔·斯图尔特(Jon Stewart)的《每日秀》(*Daily Show*)为代表的“伪新闻节目”向这种传统的划分提出了挑战。《每日秀》恶搞调侃严肃的时事和新闻,在某种程度上复兴了美国建国前后讽刺性新闻的风格。尽管它愤世嫉俗的虚无主义基调引来不少学者的批评,但是却把大量青少年观众重新吸引到了新闻节目面前。主持人斯图尔特的播报风格虽然夸张,然而他机智的评论却延续了传统新闻工作中的监督精神。本书第7章便列举了他在《交锋》节目中仗义执言、导致该节目被停播的事例。

类似的节目使不少人重新思考新闻与娱乐的关系。比如扎勒(Zaller)把传统的新闻称为全能新闻(Full News)。他把这种新闻比做是巡逻,要为公民提供能够形成意见的所有事物的信息,巨细无遗地关注所

---

<sup>①</sup> 如 Gaye Tuchman, “Objectivity as Strategic Ritual: An Examination of Newsmen’s Notions of Objectiv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77, No. 4 (1972); Dan Schiller, *Objectivity and the News: The Public and the Rise of Commercial Journalis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1; [美] 罗伯特·哈克特、赵月枝:《维系民主? 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周雨、沈荟译,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有事情。但是他发现,全能新闻的标准越高,信息越专业,选民获得的信息就越少。由于普通民众注意力有限,这种严肃的高级新闻标准实际上把他们拒于千里之外。出于现实的考虑,扎勒提出了一个新标准——报警新闻(The Burglar Alarm News),这种新闻平时可以降低标准,采用戏剧性的、娱乐的方式报道日常事件,吸引受众,但是到了关键时刻,便全力以赴关注重大事件。<sup>①</sup> 扎勒的看法引来学界的讨论<sup>②</sup>,但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实用主义方案。目前学术界和实践界也有不少人开始转换思路,提出不要简单地排斥娱乐,而要研究如何让娱乐更好地为严肃的新闻服务。这本书正好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新闻的定义:哪些原则可以妥协,哪些原则丝毫不能动摇。

第四个危机是新媒体对新闻工作的影响。新媒体抢夺了传统媒体的市场份额,这已经是毋须质疑的现实。本书作者更担心的则是新媒体会动摇新闻工作的基本标准和原则。随着博客、推特等可自由发表信息的互联网应用的出现,许多人认为专业的新闻工作已经不再重要。比如《草根媒体》的作者丹·吉尔摩(Dan Gilmor)就提出,现有的新闻是大公司生产的单向性的新闻(corporate journalism),Web 2.0则为创造双向对话的新闻(conversational mode of journalism)提供了条件。前者的经营模式使其无法为公共利益服务,后者则可以承担起这个责任。<sup>③</sup>

本书的“保守主义”立场在这个问题上也体现得比较明显。作者们承认不能忽视公民的参与,并在2007年的修订版里特地加入了一个新的原则(“公民对新闻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但是他们仍然认为专业的新闻工作是其他信息传播方式无法替代的。网民虽然可以提供有价值的内幕信息或者进行监督,但是由于其身份处于流动状态,受众无法快速地判断信息的可信性,一些别有用心网络推手和“水军”甚至会使受众无所适从。更重要的是,网络的信息良莠不齐,业余作者所生产的文章内容数量庞杂,造成受众获取信息的效率下降,甚至冲击了严肃、优质的内容生产机构。他们在数字时代强调新闻的基本原则,正是要用更严格的标准,将优

---

<sup>①</sup> John Zaller, “A New Standard of News Quality: Burglar Alarms for the Monitorial Citize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2003), pp. 109—130.

<sup>②</sup> Lance Bennet, “The Burglar Alarm that Just Keeps Ringing: A Reply to Zaller”,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2003), pp. 131—138.

<sup>③</sup> Dan Gilmor, *We the Media: 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O'Reilly Media, 2006.

质、可靠的新闻与劣质、不可信的信息区别开，重建专业新闻的权威性。

## 裸体和吉他

社会在大变革时期，往往会产生一股回到传统的思潮。这既是社会有机体本能的保护机制，也为变革时期的人们提供了一个重估传统价值的契机。尽管中国和美国的社会环境存在巨大差异，上面介绍的美国新闻界面临的危机与中国新闻界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美国新闻界长期以来形成的基本原则可以为我们思考相似的问题提供重要的参考，尤其是结合案例对新闻实际操作规范的介绍，对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尤其具有启发。

几年前，译者曾结合中国的案例，向非新闻专业的新闻工作者介绍过本书的部分内容。讲座结束后有听众感慨说，没想到学校的老师对我们的要求这么高。译者纠正说这些不是学校老师的要求，而是公众的要求。其实正如本书的作者们所提出的那样，在新闻界遇到经营危机的时刻，首先要明确的是自己真正服务的对象是谁。在信息纷繁复杂的今天，只有公众意识到媒体的价值，才会和媒体之间建立起长期的信任和契约关系。作者们在本书中提出了一个“裸体和吉他”原理（见第9章）。

如果你想吸引受众，可以到街角表演脱衣舞，脱到一丝不挂。在短时间内或许你会吸引一群看客。但问题是如何才能让他们持续观看？如何避免观众转移注意力？还有另一种方法。假设你回到同一个街角表演吉他。第一天听的人很少。但是第二天可能会多些。这取决于你的吉他弹奏水平，如果曲目丰富多样、引人入胜，观众很可能会与日俱增。如果你弹得好，就用不着去费劲地保持观众量，总能不断吸引新观众进来，替代那些听厌了的老观众。

本书所提出的大部分原则，正是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形成的维系公众的措施。因此作者们相信，优质的新闻才会最终获得市场，他们使用了大量案例进行论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公众媒介素养的提高，中国的公众迟早会对新闻工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近些年公众对于新闻伦理和新闻法制方面的关注增加，公民还自己行动起来，通过调查揭露虚假报道。这些现象发出了一个信号。如果媒体轻视受众，把一些重要的原则看成是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媒体一定会为自己的自负买单。

当然，如何做到更好地为公众服务，还需要中国新闻工作者与研究者

共同探索。排斥全球的经验、闭门造车固然不可取，简单地将西方理论照搬到中国或者仅仅为了验证西方理论的正确性而进行模仿更不可取。自信开放的立场应该是把中国看成是全球新闻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借鉴他国经验，再通过中国的实践，为新闻与民主关系的研究提供新理论，丰富全球新闻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 回到新闻—民主关系的基本问题

在新闻与民主关系的问题上，本书提出了一个“连锁公众”(interlocking public)的理论，赞成约翰·杜威的民主目的论，反对沃尔特·李普曼的民主工具论。李普曼与杜威之争是美国传媒学者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建构起来的一段叙事。<sup>①</sup> 李普曼认为新闻无法“正确”反映现实，公众无法形成“正确”民意，民主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凯瑞认为这种看法存在不足。他以杜威的看法反驳李普曼。杜威提出，民主的目标不是有效地管理公众事务，而是让人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追求人的自由。换句话说，民主本身即是目的。因此新闻乃至其他传播形式，其目的是为人们提供相互交流的机会，形成具有共同文化的共同体。<sup>②</sup>

有学者认为这种看法将小城镇的对话式交流过度浪漫化。<sup>③</sup> 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些论述并没有给出一个关于民主的清晰的、具有操作性的定义。英国学者赫尔德认为，“民主”有多种模式，它不是单数，而是复数。<sup>④</sup> 不同的民主模式对于新闻的功能、标准乃至形式都可能存在不同的看法。比如程序民主可能更强调新闻的监督和揭丑作用，竞争性民主强调新闻对政治候选人的充分报道，参与式民主强调新闻对公共问题的深入分析和公民动员，协商民主则强调新闻要成为理性意见交流的平台。<sup>⑤</sup> 尽管

---

① 其实二者在现实中并没有正面争论过这个问题。见 Michael Schudson, “The ‘Lippmann-Dewey Debate’ and the Invention of Walter Lippmann as an Anti-Democrat 1986—199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2008), pp. 1031—1042.

② 〔美〕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华夏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4—66 页。

③ Michael Schudson, “Why Conversation is Not the Soul of Democracy”,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4 (1997), pp. 197—309.

④ 〔美〕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燕继荣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年版。

⑤ Jesper Stromback. In Search of a Standard: four models of democracy and their normative implications for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 Vol. 6, No. 3 (2005), pp. 331—345.

不同的民主模式对于新闻的要求有不少部分重叠,但是不同政治意识形态对新闻的规范性要求还是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不一定在于民族国家之间,就是在同一个文化内,也存在对民主的不同理解。在深度报道和解释性报道、新新闻、精确新闻、公民新闻等新闻标准的背后都存在着关于新闻—民主关系的争论。

要对上述问题有深刻的认识,既需要大智慧,也需要借鉴其他文化的成果。眼前的这本《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将为我们思考这一问题提供重要的参考。

刘海龙

2010年12月8日



# 中文版序言

当我们进入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时,世界仍处于一百多年来变化最剧烈的时代。没有哪个国家的变迁比中国更加巨大。二十多年来,她一直被公认为全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方面的根本变革。经济增长也创造了巨大的信息流,使成长之中的中产阶级能够进一步深入地参与公共事务。中国目前这一代新闻工作者是这个变革过程的重要环节,他们既是观察者,同时也是参与者。

我们希望本书的中文版能够帮助新一代新闻工作者应对目前的新科技给他们的工作带来的各种挑战。

数字摄影、无线技术、电话、掌上电脑(PDA)和其他便携式电子设备使计算机、相机和音乐播放器的功能每天都在增加,价格也变得更加便宜。随着更多人掌握这些技术,网络新贵们找到了整合这些创新的途径。早在 2002 年,人们已经可以在互联网上发布自己的文字、照片、音频和视频。

除了技术发展以外,美国 2001 年发生的“9·11”事件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数百万人上网浏览新闻,聚集组成全国性的社区,为讨论国家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人们对互联网的依赖迅速飙升,达到了新的高度,并且还在继续增强。公民参与政治对话和社会对话,促进了“公民新闻”概念的出现。该运动的早期倡导者很早前就预见到,将来任何人都能制造和发布信息。

传统媒体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来自雅虎和谷歌这样的新闻集成商,它们发布的新闻并不是自己的原创内容,只是转载全世界传统新闻机构的新闻。虽然大多数博客和个人日记相去不远,但是其中一些博主却成为美国各政治群体的意见领袖。

2004年,博客在总统初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一年,两位在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波因特学院(the Poynter Institute)结识的青年记者制作了一段10分钟的视频,想象了2014年的媒体发展情况。这段视频预言,未来占统治地位的是谷歌开发的一种叫EPIC的衍生产品,它可以“根据每个用户的选择、消费习惯、兴趣、个人背景、社会网络调整产品,生产出属于消费者自己的内容组合”。目前,大多数新闻工作者认为这一幕完全有可能变成现实。

这些新技术带来的变化削弱了19世纪以来美国生产新闻的经济组织的实力。它们面临的挑战是能否创造新的经济模式,为不断增加的新网络受众提供服务。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令人充满希望的信号。2005年,BBC在报道7月伦敦炸弹袭击事件时,出色地利用了市民的力量,播出业余人士拍摄的视频、目击者的讲述和用手机拍摄的照片。就在几周后,当卡特里娜飓风袭击新奥尔良时,美国新闻机构证明它们也能提供定期更新的信息,并使用公民制作的内容。在传统媒体之外,公民聚集在专为突发事件设立的网络聊天室里,不断更新消息。他们收集来自不同渠道的信息,互相编辑对方的内容,订正错误,增加报道深度。

同样地,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在2008年5月也使用了当时能够利用的技术,报道了发生在四川的大地震。他们使用各种硬新闻和特稿体裁,连续多天报道了人员伤亡的新闻和震后情况。他们不仅向全世界提供了地震和灾后的信息,而且通过公民的现场目击,就灾后政府的反应提出各种问题。

由于几乎任何人都有能力制造和传播文字、视频和音频,用户对从其他资源获得的内容也产生了个人定制的需求,希望把它们都保存在某个网站上或通过软件进行管理。这些或增或减的变化说明,新闻越来越不像精心准备的演讲,而是更接近于任何人都能自由发言的对话。

技术也不断在媒体和公民之间制造紧张关系。新闻工作者受到了博主们严格的审查监督,许多组织正努力做到既把网络业务整合到新闻编辑部的工作之中,同时又不降低报道和信息核实的标准。

中文版的《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试图捕捉这些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目前的新闻界不仅要适应新的竞争环境,还必须理解并适应近来越来越被放大的公民的声音。公民不仅是新闻的消费者,也是新闻的制作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互联网的互动特征使新闻实践受到公